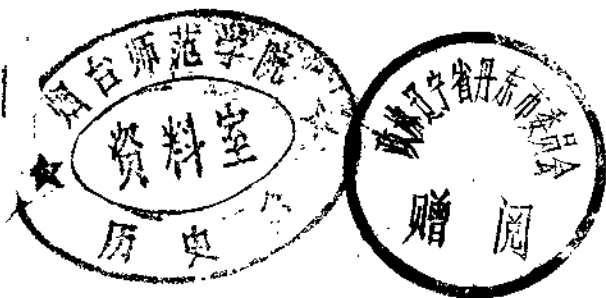


V-28
108

丹东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丹东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1987 •

目 录

- “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马腾云 李鹤云 (1)
- “教育事件”亲历记……………李介夫 (12)
- 秦有德蒙难前后……………秦道宪 (20)
- 狱中书简……………左秀海 (26)
- 父亲殉难经过……………左良知 (29)
- 安东满铁附属地……………王云峰 (35)
- “满洲舞台”的失火事件……………魏康成 崔殿芳 (49)
- 鸭绿江上的舢舨公会……………王云峰 (54)
- 丹东照相业发展简史……………王京礼 (61)
- 安东市的“丹国基督教医院”……………王立家 (74)
- 京剧小班“咏讽社”……………赵英群 罗葆成 (83)
- 大孤山第一所中学的片断……………廉维英 (89)
- 关于青城县设置情况的一点补充……………赵日学 (94)
- 邓铁梅组织的抗日自卫军……………岫岩县政协文史办 (100)
- 抗日英雄曹国土……………张醒 傅毓峰 汪世和 (109)
- 安东总商会长孙荣明……………市工商联文史组 (126)

“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

马驊云 李鹤云整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遂将我大好河山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我东北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蹂躏与苦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杨靖宇、邓铁梅、苗可秀等，先后在安东（今丹东）地区燃起抗日烽火；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不甘心当亡国奴，以各种形式，向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法西斯反动统治，采取高压手段，一方面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残酷扫荡，一方面大肆逮捕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现根据蒙难的幸存者的回忆及部分档案材料，整理出这一事件的梗概，供历史研究及教育后代的参考。

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波及的地区：

“安东教育事件”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冬（即民国二十五年，伪满康德三年）延续到一九三七年春天。日寇以“肃清东边道①救国会”为借口，以安东宪兵队为首，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开始，到翌年一月七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

注①东边道系清末民初的旧行政区划。辖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等沿江各县。

河、桓仁、通化、临江、长白等县，大肆搜捕省、县教育厅（局）长、会长、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及部分商界、财界人士达三百余人。当时，安东属省城，被捕者又绝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故人们习惯称之为“安东教育事件”。

二、事件的起因：

“安东教育事件”的起因是比较复杂的。总的来看，是日寇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对具有爱国反满抗日思想的教育界、知识界的一次血腥大镇压。其借口是“肃清东边道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爱国志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并把这个组织逐渐扩展到东北各地。据说，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廷接受北平救国会的指示，一九三二年返回安东活动。他与当时安东省教育会会长、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陈述了心情，秦积极赞成，并通过工商界以日本函馆地震救灾的名义，为救国会募集资金。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安东省教育厅举行中学教员鉴定会。在林科中学，秦有德秘密劝导各界以教育界为中心组织分会。听说，除抚松县外，安东省境内先后都组织了分会。由于这个组织是秘密的，筹集资金是通过教育会进行的，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

一九三六年，救国会事机不密，被汉奸出卖。桓仁有个盖洪洲，他哥哥叫盖维新，曾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乡里有什么难办的事，常常求托于盖洪洲，地方上一些豪绅也很器重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退入关内，盖洪洲的身价亦日趋衰落，常受一些绅士的冷遇，盖因而不满。当他

得知该县绅士金巨庭和救国会经济上有联系后，就写黑信告密，把信交给宪兵队翻译，要他转给宪兵队长砂本。翻译看了信后，没把信直接交给砂本，却先给金巨庭看了，想借此勒索。但金看出翻译的意图，怕他以此为把柄继续要挟，就拒不承认。翻译变了脸，把信交给了砂本，金巨庭等人便被宪兵队捕押起来。经过严刑逼供，金招认了。日寇宪兵队便在桓仁搜捕了一百多人。其中有个人叫李大华，曾任安东县教育局视学，李在严刑下又供出同安东县教育局有联系的人，于是，事件波及到安东。

三、疯狂的搜捕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夜间，安东县日本宪兵队突然把县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围住，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枪口直逼邓的胸口，大肆翻箱倒柜，片纸只字也不肯放过。从凌晨三点多钟搜到近六点钟，一无所获，便把邓绑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安东县教育局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县教育局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安东县第四小学校长单荣道等，搜捕时，还把他们的书籍，连同办公桌抽屉全都拿回宪兵队，带不走的大卷柜贴上封条。当晚，要捕的还有安东省林科小学校长秦有德。秦家住的是一座二进院，半夜凌晨一时许，秦家电铃响了，秦与妻子一同去开门。秦妻问：“谁？”外边答的口音不明。当秦妻开门时，秦便乘机藏在大门后边，敌人直奔里院，秦暂逃脱，藏于东坎子一位姓姜的家里（后经友人孔昭懿又转到英国楼地下室。不久，秦被汉奸秦有君密报宪兵队，后被捕入狱）。敌人没有抓到秦有德，便把秦妻和儿子

一起抓去，并搜查了秦在林校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宪兵队、警察署的小汽车横冲直撞，有时敌人将小汽车开到学校院内，指名逮捕，有时趁下班被带走，有的在路上被截走，并警告家人和同仁不得声张。第一批被日寇逮捕的有满商小学校长马仁田，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省林科中学教务主任李庆善，训育主任侯泽麟，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安东总商会长孙朗轩，图书馆长宋子云，讲演所长孙德润，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等四十二人。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宪兵队检查了商立小学的书箱，下午逮捕了该校校长刘景芳，接着就又开始第二次逮捕。十一月十六日下午，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坐着小汽车到安东县第二小学，问校长迟学禹：“你是校长吗？”迟说：“凑数”。翻译说：“宪兵队请你去有点事”，就把迟抓走了。当车到了安东省警察厅，就把迟押到一个地下室。日寇宪兵冈田拍了拍迟的肩膀，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假惺惺地说：“你的朋友大大的。”迟一看，有各学校的校长，教育局的事务员等三十多人。十二月三日，又继续逮捕了金汤小学教员陈仁轩，朝阳小学教员张仁凤，林科中学教员佟进阶。不久，又逮捕了中央银行安东支行行长淳于喜亮多人。

为此同时，日寇在各县也大肆搜捕。十二月十四日夜，岫岩守备队长藤井率部倾巢而出，逮捕了男、女中学校长关英华、赵书纬，教务主任曹甫瀛，训育主任谢忠厚，教员孔昭伦，寇绍淮及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内务局长夏渔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商务会长王凤武，财务局长李乃臣等多人。

日寇在宽甸逮捕的有：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

树春，职业中学校长吴凤宸，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财务局长栾继先，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长李铭三，万字会长王冠五，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中央银行宽甸支行经理李世瀛，县城街长唐荫阶。职业中学教师李季等人。

凤城县被捕的有：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第一小学校长关子荣，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第三小学校长姜振昌，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第五小学校长李绍岩，第三小学教务主任赵际清，商务会长白宝山等。

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寇逮捕的安东九十七人，宽甸二十一人，凤城十九人，岫岩十四人，桓仁一百一十五人，通化二十六人，庄河十四人，辑安三人，临江、长白各一人，合计三百一十一人。

四、严刑逼供与英勇斗争：

日寇以“思想犯”、“国事犯”罪名逮捕的这批人，都由宪兵队“突击”提审和严刑逼供。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提审刘景芳，问他做过什么事，刘说：“教书，没做过别的事”。这时，敌人就吩咐打手把刘的头、手、脚绑在一个长凳上，用水壶往他鼻子里灌凉水，刘不招认，被打得死去活来。十八日上午，又继续对刘施刑，把刘的两手背到身后绑紧吊起来烤打，刘仍不开口。敌人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开始上去两个人压，后增加到四人、六人、八人。只听“咔嚓”一声，刘痛的昏厥过去。苏醒后，腿断了。在提审迟学禹时，迟不讲，七个日本宪兵就把他吊起来，用铁棍、竹板、从上身打到下身，边打边吼：“你的说话”，直

打得迟不能动了，才放下来踢到墙角里，再审问另一人。豺狼成性的日寇，审讯时用尽了各种酷刑，灌凉水、压杠子、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有的还把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表现出“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伟大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用手指在毯子上划“不知道”给难友们看，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十一月十四日审讯邓士仁时，邓宁死不讲，日本宪兵就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捺到水锅里灌凉水，活活地把邓灌死了。曹甫瀛被捕后，借孩子送饭之机，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一要立志，二要放心”。当曹被拉回原教室让曹上课，敌人拍照取证时，曹还向学生发出“不当亡国奴”的庄严号召。曹被日本鬼子昼夜审讯，打得遍体鳞伤，终未变节。于瑞庭被审讯时，不但不供认，并怒骂敌人“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敌人活活打死。关英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义愤填胸，他乘敌人不备，抓过案上的刀，直向敌人砍去，当场壮烈成仁……。

面对英雄的中华儿女，敌人残暴的手段失灵后，又换了新的花招，妄图软化蒙难者，这一手又被大家识破了。王奉璋被日寇连灌四次凉水，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时，有个翻译便凑到王跟前说：“救国会，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有，但这是日本的国策，你若老不承认，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出去是个残废，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打上几年徒刑出去，还能做点什么”，但王奉璋心里有数，不管敌人怎样花言巧语，始终没有上当。敌人第五次审讯林贵家时，日寇没露面，让两个翻译把林领到街上一家商店客房里，桌上摆有香烟、苹

果、茶水。林一进去，敌人就以宾客相待，说什么这些日子让林受罪了，并说：“我们看你是个好人，想设法把你救出去。”林问：“你们能用什么法子把我救出去？”翻译说：“你就把救国会里都是谁，你们募捐了多少钱，在哪儿存的，你告诉我们，今晚就放你回家，照常当你的女师校长。”林说：“生死我都不考虑，任凭你们处置。”两个家伙一看达不到目的，又把林押回去。

惨无人道的日寇，为了逼出口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能干出来。日寇给秦有德的儿子灌辣椒面时，让九十多岁的祖母在一旁看着，还每天毒打秦的八岁女儿，问东问西。八岁的孩子，她能知道什么呢？孩子被打得直哭叫，险些双目失明。九十高龄的秦母，在敌人的酷刑下，心身受尽了折磨，坚贞不屈。王贡生受刑时，其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其父亲备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算了，其父厉声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被日寇活活打死。

在日寇的严刑逼供下，也有人在敌人写好的供词上划了押，承认拿过教育捐，但不知那是给救国会的。安东总商会的会长孙朗轩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说：“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转给救国会的，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他一个人承担了。

五、奉天陆军军法处的无理宣判

一九三六年年末的一个阴沉沉的午夜，街上行人绝迹。冰天雪地，全市电灯骤然全部熄灭，日寇宪警，如临大敌，荷枪实弹，晃着刺刀，把安东五十二名蒙难者，两人绑在一

起，押到火车站。蒙住头，装上开往奉天（今沈阳）的闷罐车，到了奉天北站，又被押上汽车，解往奉天陆军监狱。

到了奉天监狱，全给带上脚镣，一个屋里关押三到五人。开始，什么也没问，一天两顿饭。早晨高粮米稀饭，晚上高粮米干饭，半碗菜汤。

六、七天后，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一个日本鬼子，一个翻译。一个一个的提审，主要问参加什么组织，有多少人。有一次，日寇法官在提审宋安东时问道：“你何时加入救国会的？”宋答：“没参加。”法官问：“那你为什么在安东宪兵队承认参加了，还划了押。”宋说：“回法官话，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就是法官你在严刑下也得承认。”呛得法官什么也说不上来，只得把宋安东押回狱中。在提审迟学禹时，法官问：“救国会谁是头。”迟答：“没参加救国会，不知谁是头。”法官问：“在安东宪兵队怎么说参加了呢？”迟说“那是打的实在受不了，说的假话。”法官无奈也只得叫迟下去。

尽管日寇什么材料也没有问出来。但是，他还是按照他们的既定国策干下去。

阴历腊月二十六日吃晚饭的时候，一看守宣布说：“明天要宣判安东县的了。”单荣道听后，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就对看守说：“请您行个方便，给我一点纸，写个信，叫家中来人收尸”。看守给了他十多张纸，他写了信。李勤业也写了家信，给看守一些钱，叫看守把信邮走了。

第二天上午，陆军监狱的院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军法处一个科长到囚房外大喊：“大家把行理整理好”。

不一会儿，叫万寿紫、林云庭、王奉璋等十九人出监，押到法庭。法庭是一个大屋子，台上有二十多个日本军官，只有一个中国人，王某、系军法处长。他宣布万寿紫等十九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予以缓刑，当场释放。万等被摘下镣铐，领出法庭，站在监狱院内。接着喊刘景芳、钟树瑞等十四人，宣布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四个月。第三批是迟学禹、于学礼、侯泽麟、荆百斛等十九人，宣布判处十五年徒刑。最后一批，军警用枪口对着蒙难者，押到法庭，宣布孙文敷、秦有德、张镇藩等十一人为极刑。宣判后，由法警一个个架着难友推上刑车。孙朗轩大骂日本鬼子：“你们末日到啦！”临刑时孙文敷态度镇静，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有德英勇就义的第二天早晨，一封无名者的电报发给秦家，内称：“秦有德已死。”（至今秦家也不知电报是谁发来的）。上午九点多钟，虎口余生的王奉璋返安到秦家说，秦已于二十七日午后在沈阳浑河岸叫鬼子给杀害了。接着，安东日本宪兵队交给县公署死者名单一份，叫转告各家去奉天领尸，并告诉不准家人哭泣。蒙难者家属闻之，个个泣不成声。他们赶到沈阳大西关姜公祠一看，亲人已面容皆非，血迹模糊，被装在几块烂木板钉的棺材里，上面写着死者姓名。家属欲哭不准，只有含恨啜泣。家属在索取衣物时，件件都是血迹斑斑，不忍一一过目。但是，中华民族是不能被征服的，广大民众是站在死难者一边的。有的过往行人，见死者家属悲痛欲绝，怕日寇再加害于亲属，便把他们扶到僻静之处，劝其早归，免得再出是非。当死难者的棺木过往时，行人无不唉声叹息，对死难者家属投

来同情的眼光。特别是秦有德的棺木在运往火车站时，路经大西门和南市场时，遇到两次摆路祭的，使家属深受安慰和激励。但时至今日，家属亦不知摆路祭的是谁。

六、抚顺监狱里的非人折磨：

在奉天军法处非法宣判的十到二十年徒刑的，很快被转到抚顺监狱，约有八十多人。安东县的二十一人。日寇唯恐这些人再图谋不轨，便都给带上四、五斤以至八、九斤的脚镣，而且不分昼夜地让带在身上。安东县的二十一人，开始关在一个大屋子里，白天都整天坐在木板上，不准歪头斜脑，更不准讲话和看书报。不仅大小便需要报告，就是咳嗽、吐痰，晚间睡觉翻身，也得报告。有时，有人出口粗气，看守便吼道：“你心里想什么，要跑吗？”穷凶恶极，如狼似虎。监内伙食，十分粗劣。一日三餐，全是带霉味的高粮米稀饭，白菜、萝卜，不洗干净就下了锅，既不卫生，又吃不饱。一九三七年春天，监狱里发生了热病，仅“安东教育事件”一案里的难友就死了十五人。有的还没有断气，敌人就用被子给捂住，促其死亡，然后把值钱的衣物抢去，监狱里的看守，常常勒索受难者，让向家中要钱给他们使用。有的人家中无钱，无奈就将衣物给看守，以求看管的松一些。

在狱中，蒙难者亦不屈从敌人的淫威。饭食不堪入口，难友们就串通一起和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允许家属给送“簿子”（即送吃的），经过斗争，当局不得不答应，这对一些人得以活着出狱，不能不算是个原因之一。平时，难友们互相体贴，互相照顾。一年之后，让受难者到工厂里干活，但脚镣仍然不分昼夜带在腿上，有的就磨破皮，腿肿，肉里

出现紫斑，难友们就向家里要些药物和食品，帮助度过难关。安东县教育局事务员刘长德腿肿了，迟学禹就给他搓治，刘景芳就背着他上下工。难友们互爱互助，坚持活下去，要亲眼看看日寇的末日。

一切反动派都是贯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反革命两手的，日寇也不例外。一方面对具有爱国思想的志士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一方面又虚伪的搞“减刑”。第一次是伪满傀儡访日，减余刑四分之一，以后庆祝日本纪元两千六百年，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成功等，又减了三次，各减余刑的四分之一。这样，大多数是一九四三年前后出狱的。有的出狱时已气息奄奄，如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出狱后即死亡。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剃发为僧，光复后才还俗。进抚顺监狱时八十多人，活着出来的只有三、四十人了。

七、光复后的胜利控诉：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九·三”胜利后，安东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为怀念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共安东省委曾在友谊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会上死难者家属及蒙难幸存者，进行了血泪控诉，当场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田好久等三名罪犯，为人民和死难者报了仇，雪了恨，并对秦有德等家属，发放了抚恤金。一九四六年在鸭绿江造纸厂又召开了类似大会。一九四八年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市公安局处决了二十七名反革命罪犯，汉奸秦有君等受到了应有的镇压。

“安东教育事件”的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人民将永远怀念抗日救国的英烈们！

“教育事件”亲历记

李介夫

我原名李世瀛，字杰夫，现名李介夫。一九〇五年生。原籍营口县，现住丹东市，一九二三年冬，毕业于辽宁省立商科第一高级中学。一九二五年春，入旧边业银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并入伪满中央银行。一九三三年转任该行宽甸支行经理。

一九三六年，日寇在东边道各市县展开一个所谓的思想大讨伐，遍及安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首先受害的是教育界人士，嗣后，逐渐殃及其它各界，故习惯称之为“教育事件”。现将我亲历、亲见、亲闻记述如下：宽甸城内日本宪兵队从初秋起即开始捕人。县师中校长、教育会长丛树春（字育深）、职业校长吴凤宸（字定宇）、教师李季、训育主任肖懋彦、女子学校校长邹绍南、三育小学校长高某都先后被捕。我是冬十一月初，先于家内严行搜检后被捕的。拘留场所是临时改用一家歇业的浴池，室内各床位都用整匹白布包着，被拘留者都被隔离，各不相见。只有在大小便时在厕所里，在看守的监视下始有一见的机会，当时。看守人，审问人都是日本人。除在审问时用中国翻译外，其余时间见不到一个中国人。需用的被褥及饭食，都由家里人送去，但只能守候于门外，不能进入室内。

我是在晚五时前后被带入监所的。入所后立即审问，审

讯在座的有县警务局两个指导官、宪兵队小队长及一名日本警察，没有翻译、最先问话的是立山指导官，他用半语子的中国话问我：“为什么逮捕你知道么？”我自然回答说：“不知道”。这三个字一出口，立即触怒了他们。一声怒吼，四个人一齐动手将我捆吊起来。离地虽不高，但在他们四人拳、脚、棒的两面踢打游动之下，我先是哀号，后便昏厥了，豺狼们见我无声亦将无息，才将我放下来，连拖带架，将我拖到床铺上。我喘息片刻后，又被架去审讯，仍然是暴打、昏厥，然后又被拖回扔到床上。约十多分钟后，来了个日军医官，略事诊视，即给我注射，是强心剂还是止痛针，我不知道。只觉注射后，减轻了一些痛楚，肉体上的伤痛减轻了，而思想上的伤痛却增加了。我想，在沦陷区的人受到日寇的蹂躏是无处喊冤的。尽管我本身谈不到有什么公开的反满抗日的行动，但它们对中国人是充满敌意的，又何况它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第二天早饭后，审讯又开始，但指导官不见了，只有宪兵队长、中国翻译和一名宪兵，三人坐堂，仍然是简短的问话，有力的暴打，直至昏迷，才架回床上，找来军医注射。

第三天上午仍是昨日三人。这一次却公然说我是反满抗日里的重要一员，我当然要极力辨白，这又触怒他们，一个宪兵用一大碗辣椒水来灌我，只灌了一半，我就气息奄奄，呼吸失灵。它们又将我架回。这次医官来后经过一番较细的诊视，才给注射，随后又向宪兵小队长说了几句什么。从此，对我的审讯，每日虽仍继续进行，但不再动刑和拷打了。

在审讯我的同时，对其它被难者同样进行了严刑拷打，

吼声、哀号声不断。有次，在厕所里和丛校长相遇，他是故意来找我通消息的。因为这个临时监所，对大小便的时间不加限制，而监视的日本警察，又站在很远的地方。丛就对我说：“县红万字会分会长王冠五和他同时被捕，但因胡说、认供，后又反悔而反供，遭到几次毒打后，在很冷的一天，宪兵将他衣服剥光，捆在木凳上，放到院内灌辣椒水，活活被折磨死了，尸体抛向何方，谁也不知。你的床位就是原来他住的地方”。我当即向他说：“这样看，咱们宁肯被打死，也不能胡说。”他说：“太对啦。”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审讯突然中止了两三天，但捕人仍在继续。县商务会长李铭三、农会会长吕武臣，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县城街长唐荫阶等也先后被捕入监。

宽甸城内原驻日本宪兵队只有一个军曹小队队长，四名宪兵。但是，沉默几天后，忽然在一天的上午，由外地调来五、六个宪兵人员，其中有一名准尉队长、一名曹长、一名军曹及两、三名宪兵和日本、中国翻译等多人，在监所里立刻展开大规模的审讯，所有的房间都被用作审讯室。野兽般吼叫，夹杂着被难者的哀号，实在令人不寒而慄！

我被日本翻译带到他们所谓的队长面前。他坐着，让我也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用和缓的语气向我说话，由翻译转说：“你们所干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要快快地说实话，就叫你快快地回家，你可以说吧”。我哀婉地回答说：

“我有什么理由反对满洲国呢？我实在说不出我有什么反满抗日的事情来”。话刚落音，这位队长立刻显出不耐烦的神色，马上命翻译把我送回去，

次日晚七点后，一个宪兵将我带到一个最里间的审讯

室里，有一个身着便服的日本人（后来才知他是营口宪兵队曹长大曾根），他坐在办公桌的西面，让我坐在东面，开口便用流利的中国话向我说：“你是营口人，我也是营口人，咱们是乡亲，可以来叙谈叙谈。”我回答说：“这很好”。开始是山南海北不着边际的谈，从营口的知名人士，谈到沈阳，安东，以至全国各地，我对此大多数，是以闻所未闻，茫然不解的态度来回答他。以后转入正题，给我纸笔，让我写出心里话。我为了消磨时间，缓慢地将我昨天回答那位队长的话，加以润色，写了一篇多。他看过后，不加可否地递给我让再写。我又将在银行里的经历详细写出。他看后，仍命再写。我答以实无可写的东西之后，他也未再催逼，但问话却又开始。断断续续地，有关的，无关的，问个不休。那个宪兵已添了多次炉火，道上两三次开水，并坐在旁边椅子上打了多次的瞌睡，这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这个宪兵有些耐不得，过来将我拽起立在室中央，手里拿块劈柴，恶狠狠地问我：“你说话不？快快地说话”。没等我回答，便用劈柴打来，只两下便将我打倒在地。大曾根起来阻拦，他才住手。由两人将我架回监去。

第二天晚八时后，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讯问和答话，仍无结果。大曾根改用恐吓手段。此时，在外间正有一曹长刑审高校长。大曾根将门拉开，陪审宪兵将我带到门边让我看。高校长手脚捆在一起，高昂在房梁上，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而下面的军曹却还是狂吼乱叫，手持长竹杖猛打不休，我睹此惨状，立即昏迷，他们又将我拖架回床，并由军医注射。

第三天又问了很长时间，我最后哀求说：“队长啊！豆